

張青松 著

《正字通》異體字研究

丙申夏 張青松題



語文出版社

《正字通》異體字研究

丙申夏 張青松題



ZHENGZITONG YITIZI YANJIU

張青松 著



語文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字通》异体字研究 / 张青松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87-0472-9

I. ①正… II. ①张… III. ①《正字通》—异体字—研究 IV. ①H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5128号

责任编辑	金春梅
封面题字	张桂光
装帧设计	徐晓森
出 版	 语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bsywp@163.com
排 版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教图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 格	890mm×1240mm
开 本	A5
印 张	10.3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序 一

友生青松君博士學位論文《〈正字通〉異體字研究》行將付梓，望余略書數語，弁諸卷端。此誠可喜之事，余賀且允之。

明清間人張自烈之《正字通》，旨在補正明代梅膺祚《字彙》之闕失，其書誠如青松君所言，“在編排、解形、注音、釋義、引證以及字際關係說解等各個方面對《字彙》均有所補正，在辨正俗訛、考釋疑難字方面，用力尤勤，對後世字書影響頗大”，因而，“上承《字彙》，下啓《康熙字典》，在我國字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余以爲：《正字通》最大之看點在於其中羅列且有所辨析之大量異體字。從歷史之角度觀其書，可謂其代表了當時異體字研究之最高水平；從今日之角度觀其書，則彙集於書中之大量異體字最具學術研究之價值。明儒趙謙有言：“士之爲學，必先窮理，窮理必先讀書，讀書必先識字。”唐開成石經之收入《爾雅》，《隋書·經籍志》之列小學於經部，良有以也。而識字之難，則在歷代異體字之多及其間關係之複雜性：究其來源，則有造字異構、書寫變形、假借通用、類化變異、避諱改作、認非成是種種不同；辨其與相關字間之關係，則又有狹義異體字與部分異體字、一貫異體字與一時異體字、異形同字與同形異字之殊。今人以不識異體字而誤解古書、厚誣古人者，時見之矣。以此，異體字之研究誠爲治訓詁者應予重視之事。青松君此書以《正字通》豐富之異體字資源爲研究對象，第一次對書中關涉異體字訓釋之內容進行了可謂全面、深入之考察，對編者於異體字整理與研究上之成就及不足作出相對客觀之

總結與評價，因而具有較高理論意義與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從是書之寫作言，余以為以下數事頗值得提出以與讀者共享：

其一，《正字通》全書約兩百萬字，紛繁複雜、千奇百怪之難識字比比皆是，通讀一遍尚非易事，而為研究方便須將其文輸入電腦，轉換成電腦文檔，其工作量之巨大，花時費力，可以想見。

其二，作者不但窮盡性地考察了《正字通》異體字訓釋之內容及術語系統，又採用現代文字學理論對張書中之異體字作出科學之新分析；不但客觀地討論了《正字通》異體字訓釋成果之價值，又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其中訓釋之缺失及原因。以書中第四章“對《正字通》異體字材料的構形分析”為例，作者於《正字通》異體字之分類竟至兩大類、六小類、十二目之多，其中一些目下又分出若干小目，真正做到研究面面俱到，考察細緻入微。

其三，作者此書參考了大量當代學者之有關學說，遂使視野開闊，寫作更有底氣。同時又能恰到好處地利用他山之石以攻玉。如書中於異體字之定義，採用李運富先生的觀點；於《正字通》異體字之基本分類，採用王寧先生之異寫字、異構字兩分法；第五章第二節中“《正字通》對文字錯誤還原現象的認識”一目，所採用之分析方法則來自曾良先生之“文字還原”理論。而更為可貴者，則在於參考與借鑒中能有獨立之思考，敢於提出自己之見解。如在肯定趙振鐸先生“不要把訛字當成異體字”這一觀點之正確性後指出：“‘訛字’是正字學範疇的評價性概念，而‘異體’則是漢字構形學範疇的描寫性概念，二者確實不能夠混為一談。但考慮到我國古代字書裏‘訛字’概念的外延與‘俗字’概念的外延已經相當接近，所以在字書中標明是‘訛字’的，除非字書明確說明祇是某文獻用字偶然有誤，不作異體處理外，其他均應視為異體字。”可謂真知灼見。

其四，書中於《正字通》異體字字間關係之分析與辨正，頗見

作者功力，亦不乏閃光之點。此最集中體現於第六章之第一節，其中“《正字通》誤認正字，現代大型字典未予採納，筆者以為可糾正者”所舉五例，“《正字通》未與正字認同，但辨明訛俗，現代大型字典仍之，筆者考證出正字者”所舉十一例，“《正字通》既不辨明訛俗，也不與正字認同，現代大型字典仍之，筆者考證出正字者”所舉四例，大抵皆言之有據，可以信從。書中此類例子尚可舉出一些，恕從略。

青松君於《後記》中稱是書還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對所有術語的使用頻率進行窮盡性的統計”，二是“按語還未達到盡善盡美”。此當非客套之言。然因專業之特殊性，能於讀博三年中完成這樣一部洋洋灑灑二十餘萬字且具有一定水平與創見之學位論文，實非易事，可無須遺憾與自責也。訓詁之研究對象為古文獻，由於時代遠隔，人文陌生，語言發展，文字變異，僅是讀懂，已頗費周折，更何況研究乎！然余猶寄希望於青松君也。余以為，治訓詁而欲有成，所必備之條件有三：一是天賦，二是興致，三是勤奮。缺一而不可。天賦即悟性，全無悟性，舉三隅不得一隅反，欲其有成，亦難矣哉！所謂朽木不可雕也。有天賦矣，而無興致，所好不在乎是，自亦不得有成。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者，誑語耳。有天賦矣，亦有興致，然不願下苦力者，或偶有所獲，而終難大成。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非虛語也。青松君既頗有天賦，至於“人不堪其苦”之訓詁則甘之如飴，兼之勤奮有加，而天道酬勤，余是敢有所期許也。願勉旃！

王彥坤

2016年5月6日於暨南園無名室

序 二

“異體”的名稱最早見於漢代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許慎《說文解字叙》也有“改易殊體”“文字異形”的說法，所謂“殊體”“異形”，跟“異體”一樣，都是泛指文字的形體不同，包括歷時的差異和共時的差異，也包括外部書寫形態的差異和內部理據結構的差異。當然這種形體差異應該是以記錄對象的相同為前提的，否則強調形體差異就沒有意義，因為幾乎所有字符都是有差異的。

現代學術對“異體字”的認識則特別強調“共時”，把材料限定在“同音同義而形體不同”的範圍內，並且認為異體字之間“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互換”。研究的重點在形體之異，即主要從構形上分析形體差異的類型和成因。

這些研究當然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從書寫平面和結構平面解釋“異體字”的來源及相互之間的關係。但“異體字”的產生並不全是無意識的分頭重造或書寫變異，也有很多是特意構造或改寫的，是有明確使用目的的。而且無論是無意產生還是有意產生，異體字一旦產生，就有個選擇使用的問題。我們認為，人們在書面表達時如何選用某個異體字形應該不會是完全任意的。如果異體字“完全同音同義”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互換”，那就没有必要特意構造或改寫出異體字，無意識產生的異體字也不可能長期存在，因為多餘的形體没有任何附加價值。然而實際上“異體字₂”的數量遠比“正體字”多，而且跟漢字的歷史相始終，即使在現代嚴格規

範的情況下，也無法完全避免“異體字₂”的出現。（“異體字”有兩個含義，一指具有異體關係的一組字，一指異體字組中跟正體字相對的其他字。我們把跟“正體字”相對的“異體字”標記為“異體字₂”，以區別組概念的“異體字”。）可見異體字問題不完全是形體和結構問題，也是一個用字問題。因此，我們不得不尊重事實，研究事實，解釋事實，不得不對長期大量存在的異體字從使用者的角度去考察其使用心理和使用效果。我們不僅要研究異體字的“形”和“構”，還得研究異體字的“用”，有時候甚至重點不在研究“形”“構”的“異”，而應該研究“用”的“同”及“同中之異”。（參李連富《關於異體字的幾個問題》，載《語言文字應用》2002年第5期。）

異體字的記詞對象雖然相同，但在具體語境中為什麼選用這個字形而不選用那個字形，不同字形在表達功能上也許存在“同中之異”的可能，這需要從社會用字規範、個人用字習慣、文本表達意圖等多方面去分析。就異構字而言，有的表義構件不同可能顯示用字者對所記語詞意義的關注點不同（如“綈”與“袴”），有的示音構件不同可能顯示用字者的方音特點或時代音變的影響（如“逮”與“迨”），有的構意組合不同可能被用字者賦予了特殊含義（如“國”與“囯”），有的構件重疊可能被利用來強化某方面的追求（如取名用“淼”“喆”不用“渺”“哲”），有的可能利用構件的增繁以防止筆畫簡單的字被輕易篡改（如數字“弋”與“一”），等等。就異寫字而言，有的利用筆畫的增減表示避諱（如清代“玄”字減點避“玄燁”諱，太平天國姓王的“王”上面加三點避國王諱），有的利用外形的變異表示特殊含義（如倒寫“福”字表示“福到”義，大寫“酒”字的三點水旁表示酒裏摻水太多），有的利用字形的變異表達書法的追求（如王羲之《蘭亭集序帖》二十個“之”字無一同形）。就異體字的繁簡而言，選用繁或簡可能體現用字者追求繁樸之美或簡易之便的心理（如“繖”與“傘”）；就異

《正字通》異體字研究

體字的古今而言，選用古或今也許體現用字者的崇古或重今的意識（如“欠”與“冰”）。凡此等等，如果是用字者的有意選擇，就不是能夠任意“替換”的，特別是一些專名用字，如果換成異體字組中的另一個字形，也許就會被誤解為另一個人另一個地。所以研究異體字既要注意形體之異，也要注意記錄同詞項的用字之別；既要有共時的觀念，也要有歷時的眼光。事實上異體字的形成大都是歷時的，異體字的解讀困難也大都是歷時的，祇有選用才是共時的。因此過於強調異體字的“共時性”和“互換性”可能並不完全符合異體字的實際存在情況。

研究異體字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爲了自己去使用，而是爲了說明別人是如何使用的。一組字形能否構成異體字關係，主要也是根據文獻使用的情況判定。但文獻中的每次使用都祇能出現一個形體，研究異體字組必須將不同語境中功能相同的不同字形系聯起來纔行，於是就有了大型字書中異體字的溝通和專門搜集整理異體字的字典，於是字書中的異體字也成爲異體字研究的重要對象。

明代張自烈的《正字通》就是一部收錄了大量異體字並對異體字進行了訓釋和溝通的大型字書，對此書的異體字及其訓釋材料進行總結分析，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張青松的博士學位論文《〈正字通〉異體字研究》即屬於這方面的成果。

我和青松有一段師生緣分。2012年下半年，青松隨我做訪問學者。訪學期間，他除了完成結業論文《〈辭源〉字際關係用語研究》外，還堅持聽我主講的研究生課程——漢字學，積極參加每週的研究生論壇活動，給我留下勤奮好學的深刻印象。我相信他的研究成果也一定是認真完成的。

翻看《〈正字通〉異體字研究》書稿，果然文如其人，規規矩矩，有板有眼，一絲不苟。書稿在對《正字通》進行文獻校理和辭書學評介的基礎上，圍繞“異體字”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一、

全面介紹《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的術語系統與內容；二、運用漢字構形學理論對《正字通》所溝通的異體字進行構形分析；三、闡述《正字通》異體字訓釋成果的價值；四、探討《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的缺失表現及其原因。可見該書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研究異體字的，力求體現《正字通》編者張自烈的異體字觀念及其對異體字的處理，所以重點在對《正字通》異體字訓釋材料進行具體分析與客觀評價。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作者以漢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校勘學以及辭書學等理論爲指導，盡可能廣泛地參考現代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張涌泉先生俗字研究與楊寶忠先生疑難字研究的成果。作者本人也對《正字通》中的一些疑難字進行了考釋，有自己的創見。這些都爲客觀公正地評價《正字通》異體字訓釋材料的得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以學史研究爲主，以學理研究爲輔的寫法是可取的。其成果有助於異體字專題理論的深化，也值得漢字發展史和漢字學史研究者參考。

該書還對《漢語大字典》引用《正字通》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全面梳理，這在學術價值之外，也顯示出該書的應用價值。

該書對異體字材料的分析疏證是很見功力的，對張自烈的成就和失誤的評價也是客觀的。但如前文所論，字書異體字實際上是文獻異體字的彙集和溝通，如果研究字書異體字能夠克服從字書到字書的局限，更多地結合文獻實例，在構形分析的同時，也注意考察具體語境中異體字選用的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則可能會有更多的發現和收穫。我相信字書異體字的研究祇是作者治學的一個切入點，從此書起步，拓寬視野，堅持不懈，必將爲漢字的整理和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

李運富

2016年6月6日於北京師範大學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4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正字通》簡介 /1

第二節 《正字通》研究現狀 /23

第三節 本書研究之目的與方法 /26

第二章 異體字及其相關概念 /34

第一節 異體字概念的界定 /34

第二節 跟異體字相關的概念 /42

第三節 研究異體字必須注意的幾個問題 /55

第三章 《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的術語系統與內容 /60

第一節 《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的術語系統 /60

第二節 《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的內容 /88

第四章 對《正字通》異體字材料的構形分析 /101

第一節 對《正字通》異構字材料的構形分析 /101

第二節 對《正字通》異寫字材料的構形分析 /116

《正字通》異體字研究

第五章 《正字通》異體字訓釋成果的價值 /131

第一節 有助於現代大型字典編纂 /131

第二節 有助於漢字學理論的完善 /170

第三節 有助於漢語字族研究 /190

第六章 《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的缺失及其原因 /200

第一節 《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的缺失 /200

第二節 《正字通》異體字訓釋缺失的原因 /261

附 錄 《漢語大字典》引用《正字通》存在的問題 /279

主要參考文獻 /306

後 記 /314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正字通》簡介

一、《正字通》作者簡介

關於《正字通》的作者，舊本共有三種說法：或題“連陽廖文英百子輯”，或署“南昌張自烈爾公輯”，或標“南昌張自烈爾公、連陽廖文英百子全輯”。這三種說法，分別出現在三個不同階段的《正字通》版本當中。^①

第一階段的版本是康熙十年（1671年）左右出現的刻本，如白鹿書院本、弘文書院本、三畏堂本、芥子園本，等等。這些刊本中的序文俱明言《正字通》的作者是廖文英。

第二階段的版本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出現的潭陽成萬才刊本（又叫作“劉炳補修本”），新增序文均指出《正字通》的作者是張自烈，廖文英祇是刊行者。如高光夔《補刻正字通後序》說：“顧諸公皆以爲南康太守湟川廖百子所輯，而竟不知爲江右處士張爾公之書也。處士殫一生之精力，閱數十年而始成此書，欲以傳於世而力不能勝梨棗。太守聞之，許其任剗闕事，且許處士以買山之貲。處士雖喜得終隱，然尤冀得附太守之名以不朽。逮梓成，則未有一字及處士，並前言亦忘之。處士不久云逝，太守旋解組載歸。”又如連州鎮守將軍劉炳《刊正正字通序》云：“《正字通》一書，廖太守百子刻於南康。此張爾公之書也。爾公西江名宿，年老食貧，百子請以五百金易其稿。稿已入而金未出，爾公下世，百子

^① 董琨《正字通·影印前言》，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又見董琨《〈正字通〉一書及其作者》，《辭書研究》1996年第3期。

擅之。百子之利與名俱得，爾公之名與利俱失，是以識者有不平之歎。丙辰之歲，予鎮連陽，兵火之餘，受殘板於其家，乃爲補葺，用表爾公之名，以正百子之實：百子之實在授梓，爾公之名在立言……余斷然刊正，所謂南山可移，此判不改者也。”

第三階段的版本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出現的清畏堂刊本。吳源起在其序文中作出了折衷的說法：“昨歲走粵中，往來信安、清海間。尋訪先生，湔先朝露，家復寥落，感慨久之。詢及成書，則以多故之餘，久屬他姓，束之高閣，好事者不得過而問也。余竭貲斧以得之，南粵諸名士皆大喜。因言書爲張爾公先生之手筆，先生購其本於衡州，晨夕較定，授梓南康。”也就是說，該書雖出自張自烈之手，但廖文英做了定稿工作，也享有部分著作權。

大約在乾隆初年，《正字通》傳入日本，日本國釋珂然極爲關注，於1741年撰《正字通作者辯》，加入討論，成爲張自烈著《正字通》辯方的第一個海外支持者。目前學界除了丁鋒^①、胡迎健^②等認爲《正字通》作者是廖文英外，一般主張作者是張自烈，代表人物有喻劍庚^③、古屋昭弘^④、董琨^⑤、張民權^⑥、蕭惠蘭^⑦、段曉華^⑧、劉澤

① 丁鋒《〈正字通〉著者是廖文英》，《辭書研究》1984年第1期。

② 胡迎健《〈正字通〉作者應爲廖文英》，《文獻》1989年第1期。

③ 喻劍庚《張自烈和〈正字通〉》，《南昌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喻劍庚《〈正字通〉作者考》，《南昌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喻劍庚《〈正字通〉爲張自烈所輯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1年第3期。

④（日）古屋昭弘《〈正字通〉版本及作者考》，《中國語文》1995年第4期。

⑤ 董琨《正字通·影印前言》，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又見董琨《〈正字通〉一書及其作者》，《辭書研究》1996年第3期。

⑥ 張民權《張自烈〈正字通〉原本考正及其古音注釋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5期。

⑦ 蕭惠蘭《張自烈著〈正字通〉新證》，《湖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5期。

⑧ 段曉華《〈正字通〉著作權考辨——兼論張自烈、廖文英之關係》，《南昌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民^①，等等。

張自烈（1597—1673），字爾公，號芑山，又號誰廬居士，江西袁州宜春北廂上水關（今宜春市袁州區秀江街）人。張氏自幼勤奮好學，由於家境不殷，無力購書，因此經常外出借書，用蠅頭小楷手抄成冊。崇禎初年，蒙禮部尚書姜曰廣推薦，執教於閭門。^②崇禎末年為南京國子監監生，前後寓居南京三十年，與侯方域、陳貞慧、賈開宗等名士交遊甚契，頗有文名。張氏好藏書，除去日常必要開銷外，稍有餘錢，便用來購書。寓居南京期間，購書三十餘萬卷。崇禎七年（1634年）攜書返鄉。明末離亂，張自烈攜家輾轉避亂，流亡他鄉。入清後累徵不就，閉門著述。康熙十年（1671年），張氏應南康知府廖文英之延聘，寓居廬山，主講白鹿洞書院。康熙十二年（1673年），張自烈在廬山逝世，葬於白鹿洞山外之鄭家沖^③（一說白鹿洞左青龍山^④），墓今存。張自烈治學嚴謹，博物洽聞，終生從事校讎、講學工作。著述甚豐，其中多數在離亂中散失，付梓傳世的有《正字通》《四書大全辨》^⑤《諸家辨》《古今文辨》《芑山文集》《芑山詩集》等十餘種，而尤以《正字通》影響最著。

廖文英，字百子，號昆湖，廣東連州保安人。明末貢生。明

① 劉澤民《〈正字通〉作者問題補證》，《中國語文》2010年第6期。

② 宜春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宜春市志·人物傳·張自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第919頁。

③ 清·安世鼎《江西通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15冊，第514頁。

④ 清·程國觀《宜春縣誌》卷二十三，道光三年刻本。

⑤ 張自烈所著《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曾作為存目入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總目》對其生平有簡略評介：“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國子監監生。自烈與艾南英為同鄉，而各立門戶，以評選時文相軋，詬厲喧呶，沒世乃休，蓋亦社黨之餘派也。”見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版，第314頁。

崇禎十年（1637年）曾任江西南康府（今九江市）推官。明朝滅亡後，返家鄉連州組織義軍，長期抗擊清軍。見復明無望，遂降清軍，協助平定三連瑤壯。康熙六年（1667年），得宰相洪承疇舉薦，官至南康知府，兼白鹿洞書院山長。^①康熙十二年（1673年）去職，攜家眷返回故里。^②

二、《正字通》成書過程及版本簡介

《正字通》原名《字彙辯》，旨在補正明代梅膺祚編纂的《字彙》。此書初輯於明朝末年^③，成書於康熙初年。張自烈《復友人論〈字彙辯〉書》云：“歷覽《字彙》各部，謬誤枚舉不盡，天下識者皆得而指摘之，駁正之，辯豈獨芑山乎？芑山即不辯，豈無繼芑山者辯之乎？”^④又《字彙辯序》：“余故折衷諸家，補《字彙》舊本罅漏，合鋟問世。”^⑤《正字通》凡例第一云：“慮四方沈湎《字彙》日久，不仍存舊說，彼此是非必不著，故部畫次第如舊，闕者增之，誤者正之，未可與各坊翻刻同日語。”顯然，《字彙辯》的編纂目的與《正字通》是完全一致的。《字彙辯序》稱《字彙》為“舊本”，與《正字通》對《字彙》例稱“舊本”的體制亦相吻合。張氏由於

① 清·周兆蘭、毛德琦撰《白鹿洞書院志》（同治十年補刊本）卷五《主洞》：“廖文英，號昆湖，連州人。知南康府，督洞學事，置田清租，增號舍，繕牆垣，宿洞課士，興廢舉墜，以師事張汝公，刻有《正字通》行世。”這裏的“張汝公”即“張爾公”。

② 段曉華《〈正字通〉著作權考辨——兼論張自烈、廖文英之關係》，《南昌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③ 明·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字彙辯序》署崇禎壬午孟夏日，即公元164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398冊，第248頁。

④ 明·張自烈《芑山文集》卷九，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第188冊，第111頁。

⑤ 明·張自烈《芑山文集》卷十二，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第188冊，第156頁。

無力付梓（包括幫亡友出版文集^①），加上老無子息，爲了死後能葬於白鹿洞旁，因此與廖文英達成協定，將所著《字彙辯》易名爲《正字通》，並在其著作中刪除了與《正字通》的寫作有關的一切記載，將《正字通》的著作權徹底奉送給廖氏。^②廖氏花了三年左右的時間，對《正字通》加以修訂增補，於康熙九年（1670年）以自己作爲唯一作者的名義付梓刊行。^③

在《康熙字典》問世（清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之前，《正字通》曾經廣泛流行，出現了不少版本。按照出版時間的先後，依次有白鹿書院本、弘文書院本、三畏堂本、芥子園本、劉炳補修本、清畏堂本，等等。

《正字通》最早的版本是白鹿書院本，後來的劉炳補修本、清畏堂本與之基本上是同版的。^④日本內閣文庫藏白鹿書院本封面云：“廖百子先生輯，潭陽成萬才梓”，並押有“白鹿書院藏板”的朱文方印，這跟廖文英《正字通叙》說的“會坊人鳩貲，就版於白鹿洞，因名曰《正字通》”完全吻合，應該就是廖文英擔任白鹿書

① 明·張自烈《芑山文集》卷二十二《再告吳次尾文》：“某痛念《樓山集》，兄生時屬余手評重梓，遭亂不果。兄殉難後，某搜羅散佚，參五編次，私謂後死者宜代梓行世，會旅食孔艱，罔克卒事，晨夕永歎而已……朝宗、辟疆二子皆力能襄梓《樓山集》，然皆不踐前諾，貽世姍笑。嗟呼！死友焉可欺哉……故舊醴資協梓，集始告成。”見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第188冊，第270-271頁。

② 清·方中通《陪集》卷二《篆隸辨叢自序》曰：“先君文忠公《通雅》，於六書之學，已見端厓。嘗命通輯篆韻……張芑山先生聞之，喜曰：‘吾可以成《字彙辯》矣。’時先君天界圓具後，閉關建初寺之竹軒。芑山先生居止數武，朝夕叩關，商略可否。日輯七字爲度，殆二十年而書成。易名《正字通》，舉而贈之廖昆湖。因先生隱居不名之志歟？”方中通《陪詩》卷一尚有《芑山先生初輯〈字彙辯〉，時過竹關，取老父〈通雅〉商榷》一詩，亦言及此事。按：方中通是方以智的次子，方氏父子是張自烈著《正字通》的重要見證人。

③ 董琨《正字通·影印前言》，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年。又見董琨《〈正字通〉一書及其作者》，《辭書研究》1996年第3期。

④ （日）古屋昭弘《〈正字通〉版本及作者考》，《中國語文》1995年第4期。